

第二章

合意开放度：基于部分国家的探析

开放度合意与否，是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对开放相关各方而言，对外开放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始终并存。充分利用开放带来的机遇，妥善应对开放导致的挑战，均需要高效地平衡开放度与发展水平、开放进度与竞争力提升、开放本领与治理能力、开放实力与责任担当、开放获益与包容共享之间的关系，在不同时期、不同发展水平上寻找二者的“黄金结合点”。^①

一 世界开放中的合意度问题

（一）国别开放度的多元性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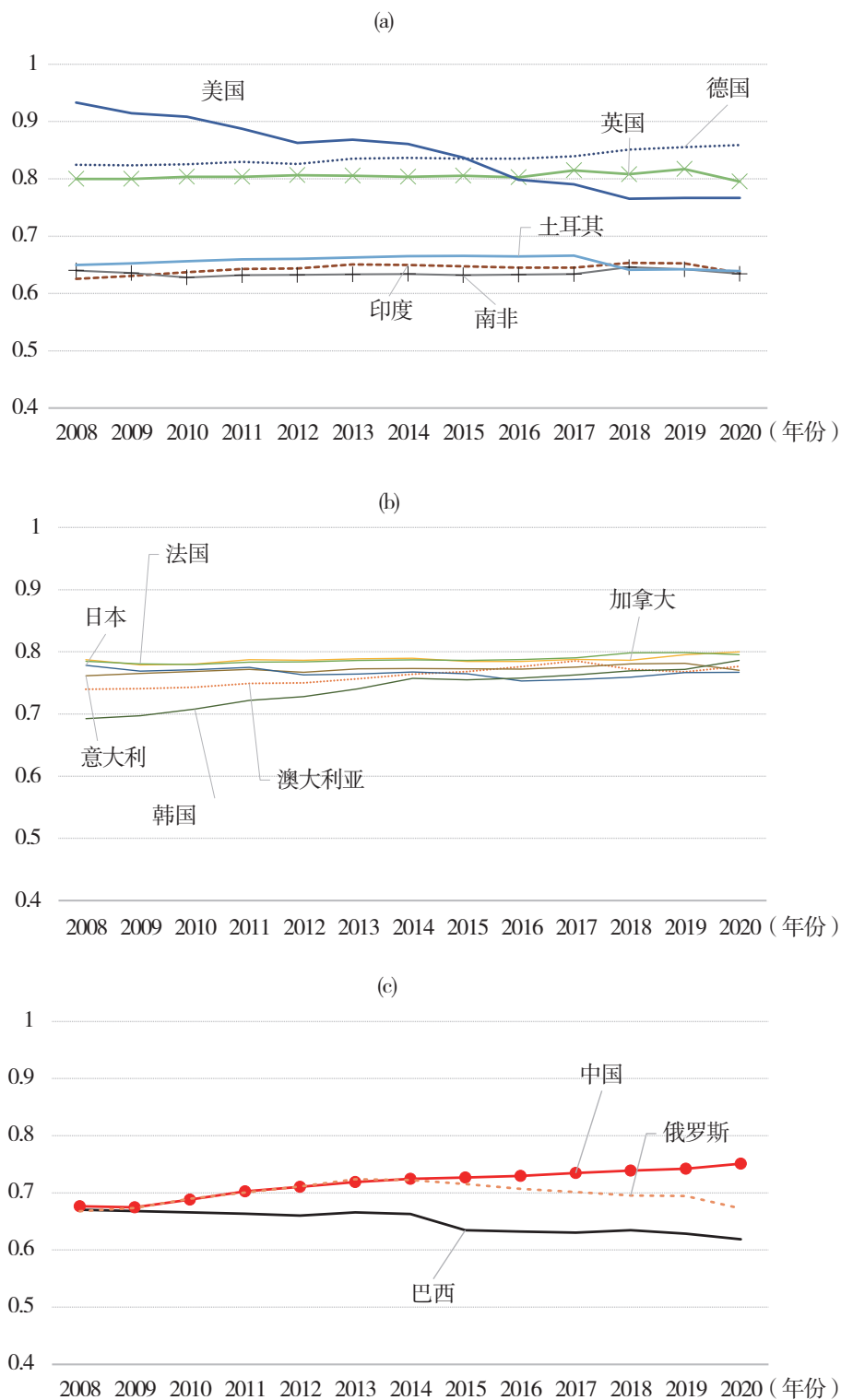
以二十国集团（G20）中的成员国为样本。2008–2020年，G20的19个成员国开放指数介于0.6189和0.9328之间，简单算数平均值为0.7271。在世界开放指数2020年榜单的129个经济体中，它们的开放指数最高为0.8591（德国），最低为0.6189（巴西），排名介于第2名和第107名之间（见图2.1）。

按开放指数在2008–2020年的简单算数平均值，G20的十九个成员国可以分为如下三组。

第一组，平均开放度最高的3个国家：美国，德国，英国，简单算数平均开放指数分别为0.843、0.8365和0.805，是开放指数超过0.8的仅有3个G20成员国，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研究中心：《世界开放报告202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5页。

参见图2-1 (a)。这三国的开放指数介于0.7653 (美国, 2018年) 和0.9328 (美国, 2008年) 之间, 简单算数平均开放指数为0.8282。美国开放指数的变异系数为0.0712, 是开放度离散程度最大的G20成员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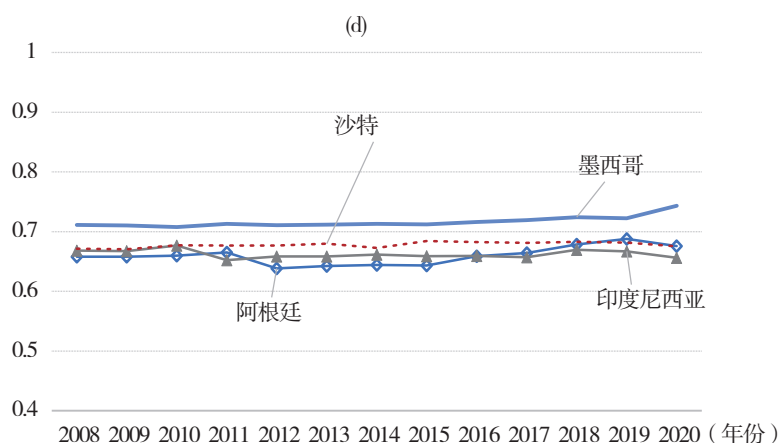


图2.1 19个G20成员国的开放指数，2008-2020年

第二组，平均开放度介于0.7和0.8之间的8个国家：按2008-2020年简单算数平均开放指数自高而低，依次为法国（0.7879）、加拿大（0.7876）、意大利（0.7718）、日本（0.7658）、澳大利亚（0.7608）、韩国（0.7422）、中国（0.717）和墨西哥（0.7165）。这八国各年的开放指数介于0.6747（中国，2009年）和0.7998（加拿大，2020年），简单算数平均开放指数为0.7562，其中韩国和中国开放度离散程度较大，开放指数的变异系数分别为0.0405和0.0346。

第三组，平均开放度介于0.6和0.7之间的8个国家：按2008-2020年简单算数平均开放指数自高而低，依次为俄罗斯（0.6981）、沙特阿拉伯（0.6779）、印度尼西亚（0.6623）、阿根廷（0.6596）、土耳其（0.6558）、巴西（0.6490）、印度（0.6431）和南非（0.6350）。这八国各年的开放指数介于0.6189（巴西，2020年）和0.7241（俄罗斯，2013年）之间，简单算数平均开放指数为0.6601。其中，巴西、俄罗斯和阿根廷的开放度离散程度最大，开放指数的变异系数为在0.0229和0.0291之间。

当然，上述分组方法简单，但结果直观。G20成员国几乎囊括了世界上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但开放度是多样的，相应世界排名有高有低。

——高收入国家有10个（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韩国、沙特阿拉伯、英国、美国），开放指数的世界排名最高为第2名（德国），

最低为第71位（沙特阿拉伯）。除沙特阿拉伯外，其余九国均为发达经济体，开放指数的世界排名最高与最低分别为第2位（德国）和第27位（美国）。

——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有7个（阿根廷、巴西、中国、墨西哥、俄罗斯、南非、土耳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有2个（印度、印度尼西亚），开放指数的世界排名最高与最低分别为第37位（中国）和第107位（巴西）。

那么，在1980–2020年中，这19个G20成员国样本期内各年开放指数是否令各自及开放伙伴经济体满意呢？这就需要评估开放度的合意性。

二 合意开放度的典型样本分析

（二）合意开放度问题的理论分析

“合意”一词在法学、语言学和经济学中皆有应用。在经济学中，相关概念如“合意增长率”，即得到储蓄率保证的经济增长率。本章对“合意开放度”的界定借鉴了合意增长率概念。

1. 合意开放度的概念

开放的合意性（warrantedness），是指开放度得到开放当事主体开放能力保证（warrant）的特性。该界定包括如下关键词。

第一个关键词是“开放当事主体”，即实施开放行为的国家或作为国家组成部分的主体^①。本章聚焦的基本单位是经济体，故以经济体作为开放的当事主体。

第二个关键词是“开放能力”，即一个经济体相对于伙伴经济体的开放比较优势/劣势以及治理开放维度、力度、速度、秩序等的现实能力。开放能力

^① 国家的常见组成部分是部门，如机构部门和产业部门。按国民账户体系的定义，常住机构可分属如下五个机构部门：一般政府部门，非金融公司部门，金融公司部门，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部门，住户部门。与常住机构进行交往的非常住机构统称为国外部门。常见的另一个概念是产业部门，每个产业部门对应着国际标准产业分类的各个产业，包括最详细的产业分类层级以及基于其上的经汇总形成的较高级别（如中类、大类以及最终的门类）。个体指做某件事的经济主体，即经营者，指参见 United Nations, European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 World Bank (2009).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2008*, para. 4.24 and 5.46.。

越强，开放度就可以越高，反之则越低。开放能力的主要决定变量是经济体的禀赋，包括先天禀赋和后天禀赋，前者如地理区位和自然资源等，后者如人口、生产技术、劳动力素质、资本、制度、文化等。一些禀赋会提高开放能力，另一些禀赋会降低开放能力，最终，所有禀赋共同决定开放能力的强弱。

第三个关键词是“保证”，一个经济体特定开放度需要相应的开放能力来支持，后者如果不超过该经济体开放能力的最大值，该开放度就得到了保证，否则就未得到保证。

综上，一个经济体的合意开放度（warranted openness），就是得到了该经济体开放能力保证的开放度。

从理论上讲，合意开放度具有如下特点。

其一，合意开放度可以有多个。一个经济体的开放能力只要不超过其最大值，相应的开放度就是合意开放度。需要最大开放能力来保证的开放度，是该经济体最大的合意开放度。显然，低于最大合意水平的开放度，肯定有多个，也都属于合意开放度。超过最大合意开放度的开放度，就不是合意开放度，即不合意开放度。

其二，最大合意开放度在短期内较为稳定，中长期内则可能发生明显变化。这是因为，一个经济体的禀赋在短期内的变化可能会较为缓慢，由其决定的开放能力以及后者所保证的最大合意开放度因而较为稳定。一个经济体禀赋在中长期内的变动可能会比较明显，由其决定的开放能力及后者所保证的最大合意开放度会发生明显变化。

其三，最大合意开放度利用了最大的开放能力，应作为各经济体开放实践探求的主要目标。

2. 与最优开放度的关系

一个经济体的开放度是由对其开放的需求（以下简称“开放需求”）和其对开放的供给（以下简称“开放供给”）共同决定的。开放需求和开放供给相等时形成的真实开放度是均衡的开放度，包括低水平的均衡开放度以及高水平的均衡开放度。

当开放需求较低时，与之形成均衡的开放供给显然低于其最大开放能力，此时仅部分开放能力得到利用。当开放需求较高时，与之形成均衡的开放供给处于较高水平，此时大部分开放能力得到较充分利用。

当开放需求足够高到以至利用了最大开放能力时，所形成的均衡开放度就是最优开放度（optimal openness）。显然，开放度是否最优，既取决于开放能力是否得到最大利用，也取决于开放需求是否足够高并同最大开放能力形成均衡。

合意开放度不一定是最优开放度，而最优开放度一定是合意开放度。在开放度处于最优状态时，开放能力的利用达到其最大值，相应的开放度就是最大合意开放度。

同开放需求匹配的开放供给水平如果超过最大开放能力，就是过度开放，可能会带来膨胀性的开放，是不可持续的。这是因为，过度开放需求所要求的开放供给超过了自己的最大开放能力，于是开放供给出现缺口，进而开放的供给与需求就会失衡，最终推动开放需求回调至开放能力所能保证的范围内。

3. 开放度的合意性要以发展为根本指向，力争达成最优开放度

开放度合意，就意味着开放带来的效应让开放当事经济体满意吗？一个经济体对外开放所服务的特定目标，属于开放带来的结果效应。开放的结果具有相当丰富的内涵和外延，足以对其做出最恰当概括的概念，可能就是“发展”了。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恰如查里、科尔布里奇^①所言，“发展”自诞生以来，已成为人类引用最多的词语之一，但也是最具争议的词语之一。在既有海量文献中，“发展”一词已广泛适用于多个领域，如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和政治发展。这同本报告“开放指数”所定义的开放是全面对应的：跨境开放同样覆盖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多个维度。如同开放概念，“发展”概念也适宜于所有经济体：无论发展的起点或高或低，还是当前发展的水平或高或低，任何经济体都总是处于发展之路上，其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领域的发展都是没有止境的，始终存在持续发展的必要。一个例证是，

^① Chari, S. & Corbridge, S. (2008). Introduction of Part I : The Object of Development. In *The Development Reader*, Routledge, The 1st edition., pp. 3-8.

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很长时期内都是贫穷经济体，后来扩展到后进经济体（backwards economies）或发展中经济体，现在则几乎涵括了所有经济体，因为其研究目的是为这些经济体“探索……享受日益发展的繁荣的途径”^①。显然，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所有经济体都有权享受自身以及这个世界“日益发展的繁荣”。

一个经济体的发展同时具有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内涵。在宏观上，发展是指该经济体某些特定宏观目标总量的增长和结构的转型（Sumner & Tribe, 2008^②）。在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史文献中，“结构”均指部门（sectors）在经济（以生产和要素使用而论）中的相对重要性，即对经济总体的细分，进而从技术或行为关系推演为某些比率（前者如投入-产出系数，后者如总储蓄率）；“结构转型”（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指相互关联的众多结构的变化过程（Syrquin, 1988^③）。在微观上，发展“事关个人的生与死、福利与疾病、幸福与痛苦、自由与脆弱等”（Sen, 1988^④；Meier, 2001^⑤），指该经济体所属个人行为选择机会的增加、能力的提高和福利的改善，具体表现为个人“在物质上的富裕”以及“在工作场所的尊严、自由与满意”（Clive Bell）。发展的宏观内涵和微观内涵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当二者达到一致时，该经济体的发展就处于其最优水平。

开放以发展为目的，是发展的手段。通过开放达成的发展，就是开放性发展，简称开放发展。开放是发展的众多手段之一，旨在通过内外联动推动高质量发展：既要提高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也要加强运用国际经贸规则

① [英] 约翰·伊特韦尔、[美] 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第1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84-891页。

② Sumner, A. & Tribe, M. (2008).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tudies: Theories and Methods in Research and Practice*, 1st editi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③ Syrquin, M. (1988). Patterns of structural change. In *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edited by Chenery, H. & Srinivasan, T. (1988), North Holland, Chapter 7, pp. 203-273.

④ Sen, A. (1988). The concept of development. In *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edited by Chenery, H. & Srinivasan, T. (1988), North Holland, Chapter 1, pp. 9-26.

⑤ Meier, G. (2001). Introduction: Ideas for Development. In *Frontiers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The Future in Perspective*, edited by Meier, G. & Stiglitz, J. (2001), The World Ban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11.

争取国际经济话语权的能力。在中国，开放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专栏2-1 中国的新发展理念

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

新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其中，创新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协调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发展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开放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的内外联动问题，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

新发展理念顺应时代要求，对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如果一个经济体的发展效应理想，就说明其开放度合意甚至最优。如果一个经济体的发展效应不理想，就说明开放度可能存在如下某（些）问题。其一，开放度合意，但开放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均衡处于偏低水平，开放能力的利用未达到其最大值，开放的发展效应乃至总体发展效应都未最大化。其二，开放度不仅合意，而且最优，但开放的发展效应同其他方式带来的发展效应未达到最佳协同效果，可能导致总体发展效应不理想。其三，开放度不合意，即开放度超过了最大开放能力所保证的范围，开放可能过度了。

（一）方法、变量与数据

以开放为中心，将决定开放的原因同开放的发展效应连接在一起，就构成了如下因果链：

开放能力 → 开放 → 开放的发展效应。

显然，开放过程的表现之一就是开放度，位于上述因果链的中心。

该链条前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显示，既然开放度的合意性由开放能力保证，

那么就可以基于开放能力来评估开放度的合意性。

该链条后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显示，既然开放会形成发展效应，那么就可以基于发展效应来评估开放度的合意性以及它是否最优。

从方法论上看，无论是从开发的发展效应还是从开放能力对开放度的决定性，都可以界定和测度开放度的合意性。不过，在理论与实践，作为开放度的决定力量，开放能力的内涵较易界定，但其外延较难界定和测度。同理，发展效应的决定力量也是多元的，开放只是其中之一，要从中精准识别开放的发展效应同样较难。

本章随后部分尝试将开放度同发展效应直接联系起来，初步探索这种联系的紧密性，对开放度的合意性做出简明而直观的评判，以期同二者之间的因果性研究形成互补。

前已述及，发展在宏观上表现为“总量增长和结构转型”，在微观上表现为“个人行为选择机会的增加、能力的提高和福利的改善”，因此本章应用“发展指数”来测度发展的绩效。^①

表2.1 发展指数的基础指标

	指标	说明	数据来源	权数
1	GDP 真实增速	测度报告年环比上一年的真实经济增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	0.5
2	收入基尼系数，年际变动	收入基尼系数测度经济体内部个人或家庭之间的收入分配，部分经济体为消费的分配。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	0.3
3	人文发展指数 (HDI)，年际变动	测度平均意义上的个人选择机会、能力和福利水平。 ^②	联合国开发署 (UNDP) ^③	0.2

① 综合指数法存在一个缺陷，即各年的发展指数无法反映经济变量之间跨年的动态效应，即相邻部分年份之间的发展可能存在的黏性效应。

② HDI 为如下三个细分指数的加权均值：预期寿命指数（基于出生时预期寿命）；教育指数（基于2个指标：不低于25岁者平均受教育年限，适龄儿童预期受教育年限）；国民总收入指数（基于人均GNI ppp\$）。

③ <https://hdr.undp.org/data-center/human-development-index#/indicies/HDI>。

发展指数是如下三个基础指标年际变动的加权综合值：GDP 真实增速；收入基尼系数（家庭或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人文发展指数（HDI）。各指标的定义、详细说明和数据来源参见表2-1。其中，HDI的细分指标也有经各自分布差距调整的升级版，基于这些调整后的细分指标加权而来的HDI升级版，可替代收入基尼系数和HDI的加权，但其数据时序仅限于2010-2019年，不满足本文计算“发展指数”的要求。

在构造发展指数时，其基础指标的权数如下：GDP 真实增速的权数为0.5，收入基尼系数的权数为0.3，人文发展指数的权数为0.2。在加权之前，这三个基础指标的量纲均统一为0-100，其中收入基尼系数和人文发展指数的取值本就在0-100，GDP 真实增速按2008年=100换算并转化成0-100的数值。权数的确定原则体现了人们关于发展的如下理解。其一，增长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所谓“一切问题”包括结构演变和个人选择机会、福利和能力的改变。其二，收入结构是众多结构中较为重要的一种，主要决定于生产结构特别是生产投入的结构，并主要决定消费结构。对发展而言，生产结构比收入结构更具基础性，但因许多经济体缺乏一致且长时序的细分数据而不易测度。作为个人福利结构的测度，消费结构比生产结构和收入结构更合适，但其基础数据在多数经济体中均不易得，而且在部分经济体中会受到消费金融发展程度的较大影响。其三，人文表现既是经济发展的源泉，也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为减少HDI同GDP增速和收入基尼系数之间存在的循环因果效应，本章为HDI所赋权数为三者中最低。当然，即使基于这三点理解，三个指标的权数分配仍可以选择其他方案，读者可以另行尝试。

由于样本期内部分指标基础数据并不完整，部分国家发展指数数值在部分样本年并不可得，其中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的发展指数序列全部数值均不可得。

对于开放同发展之间的联系，本章采用间接评判法，以发展为“结果”，以“开放”为原因，应用最小二乘法（OLS）来估计开放对发展的效应。备选办法是以开放能力为“原因”，以开放度为“结果”，应用相应的计量方法来估计开放能力对开放度的决定效应，不过“开放能力”的测度面临较高难度。这两种

方法的共同不足在于，开放与发展的关系尚未得到科学严谨的专业理论模型的充分阐释^①，导致前述实证方法识别出来的因果关系不一定是理论模型所阐释的因果关系。

（二）开放度合意性的判别

基于2008–2020年17个G20成员国“开放–发展关系”的计量分析结果如表2-2所示。计量估计考虑了两种情形：（1）不考虑国别异质性；（2）考虑国别异质性。前者的结果见该表上半部分第一列，后者的结果见该表其余部分。

表2.2 部分G20成员国2008–2020年“开放–发展”联系的计量估计结果

	开放显著促进了发展									开放拖累发展
	成员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中国	墨西哥	澳大利亚	印度	韩国	美国
开放度	0.5124*** (6.58)	6.9454*** (2.46)	6.4932*** (7.03)	5.7774*** (6.02)	4.2446*** (11.80)	4.096*** (2.20)	3.4549*** (9.51)	3.4119*** (8.02)	1.6732*** (14.55)	-0.8524*** (-14.11)
常数项	0.3726 (6.51)	-4.808 (-2.11)	-4.3045 (5.93)	-4.0118 (-5.02)	-2.3664 (-9.21)	-2.2139 (1.66)	-1.8362 (-6.66)	-1.6221 (-6.01)	-0.4378 (-5.23)	1.4982 (29.13)
样本数	178	10	11	11	12	13	11	4	9	12
R2	0.1974	0.4311	0.8471	0.8008	0.933	0.3065	0.9095	0.9708	0.9678	0.9522
F	43.29	6.03	49.46	36.2	139.24	4.86	90.37	64.26	211.77	199
	开放未显著影响发展									
	加拿大	巴西	土耳其	日本	南非	印度尼西亚	阿根廷	意大利		
开放度	6.7852 (1.80)	-0.8682 (1.36)	-0.8241 (-0.25)	-0.9050 (-0.47)	-2.8403 (-0.58)	-2.6999 (-0.68)	-0.7518 (-0.76)	-2.0181 (-1.09)		
常数项	-4.5546 (-1.53)	1.3053 (3.15)	1.2385 (0.56)	1.5029 (1.00)	2.4488 (0.79)	2.4840 (0.94)	1.2853 (1.97)	2.3512 (1.65)		
样本数	10.0	13	12	6	7	13	13.0	11		
R2	0.2873	0.1442	0.006	0.0513	0.0625	0.0402	0.0500	0.1165		
F	3.23	1.85	0.06	0.22	0.33	0.46	0.58	1.19		

注：* $p < 0.1$, ** $p < 0.05$, *** $p < 0.01$ 。括号内为t统计量。

① 具体领域的开放同具体的发展内容之间已经得到一些专业理论模型的阐释，比如“贸易–增长”理论、“直接投资–增长”理论，但尚待进一步将经济（含贸易、投资、金融）、社会与文化开放统合在一起，并建立起共同发展（增长、结构转型、个人能力提高和福利改善）之间互动关系的理论模型。

基于样本数据的计量分析揭示，开放对发展具有显著影响。以发展指数为因变量，以开放度为自变量，以G20部分成员国1980–2020年的实践为样本（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缺乏发展数据而除外），应用最小二乘法（OLS），采用stata软件的结果估计结果如表2-2所示，基于这些结果的分析如下。

2008–2020年，不考虑国别异质性的结果显示，开放度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会使发展指数提高0.512个百分点（参见表2-2上半部分第2列）。

在考虑国别异质性后，开放并不一定对所有国家的发展都具有显著影响。8个国家的开放显著促进了自身的发展，另外8个国家的开放并未显著影响自身发展。

——有8个国家的开放度促进了自身的发展。如下8个国家（按“影响”自大而小排列）的开放显著促进自身的发展：英国，法国，德国，中国，墨西哥，澳大利亚，印度，韩国。

——有8个国家的开放度同自身发展的关系在统计上是不显著的。如表2-2下半部分所示，在加拿大、巴西、土耳其、日本、南非、印度尼西亚、阿根廷和意大利，开放对发展的影响不显著。

对于开放显著促进自身发展的前述8个经济体而言，基于上述计量结果，计算发展指数拟合值，如果某年实际发展指数大于拟合的发展指数，那么相应的开放度就可以被认为具有较高的合意性，相应年份就是较高水平的合意开放年。

基于以上标准，样本期内八个G20成员国开放度合意的年份统计如表2-3所示。

表2.3 八个G20成员国较高水平的合意开放年，2008–2020年
（仅限于发展指数数据可得年份，按开放度合意年份占比降序排列）

序		合意开放年	发展指数		合意开放年份数占比%
			计数（年）	时序	
1	中国	2008–2010、2016–2019	7	2008–2019	58.3
2	韩国	2010–2012、2015–2016	5	2008–2016	55.6
3	法国	2010–2012、2015–2017	6	2008–2018	54.5

续表

序		合意开放年	计数(年)	发展指数	计数(年)	合意开放年份数占比%
				时序		
4	墨西哥	2013-2019	7	2008-2020	13	53.8
5	印度	2008、2011	2	2008-2011	4	50.0
6	英国	2008、2014-2017	5	2008-2017	10	50.0
7	德国	2008、2012、2015-2017	5	2008-2018	11	45.5
8	澳大利亚	2012、2013、2018	3	2008-2018	11	27.3

表2-3显示，在样本期内，在发展指数数值可得年份中，较高水平合意开放年份所占比重，中国最高，达58.3%，其次是韩国（55.6%），第三位是法国（54.5%），其后依次是墨西哥（53.8%）、印度（50.0%）、英国（50.0%）、德国（45.5%）和澳大利亚（27.3%）。

中国、韩国、法国和墨西哥开放水平较高的合意开放年份如图2-2所示。其中开放水平较高的合意开放年份已标注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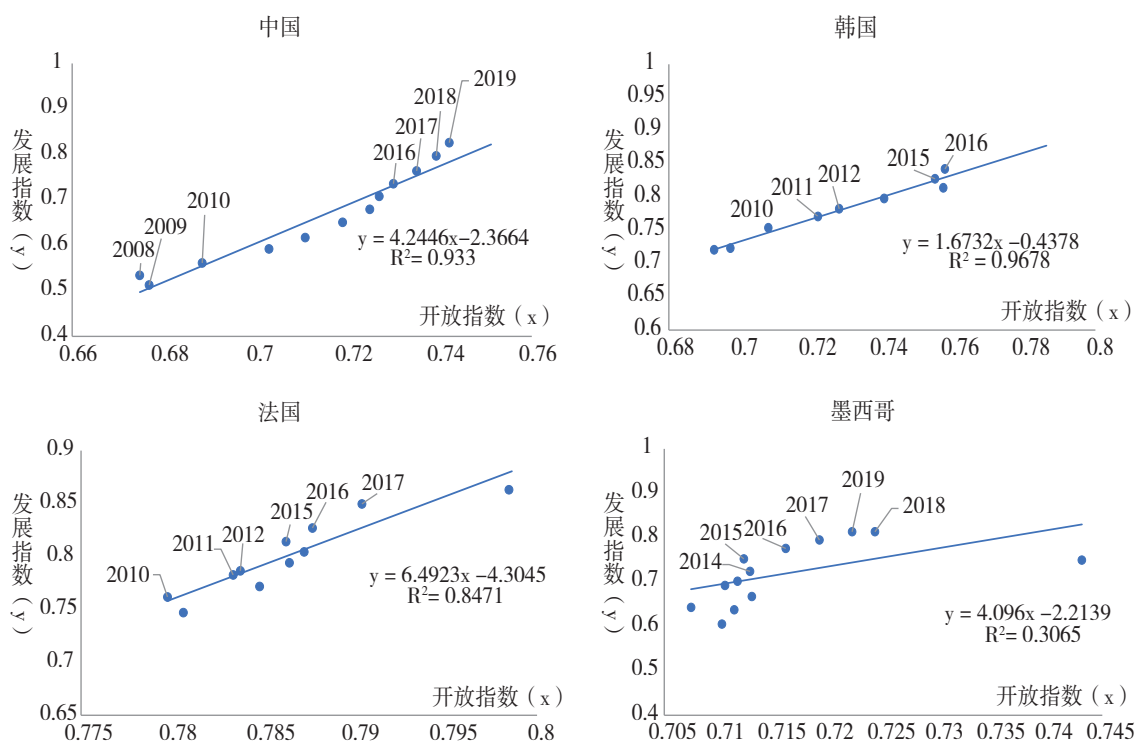


图2.2 较高水平的合意开放年：中国、韩国、法国和墨西哥，2008-2020年

印度、英国、德国和澳大利亚开放水平较高的合意开放年份如图2-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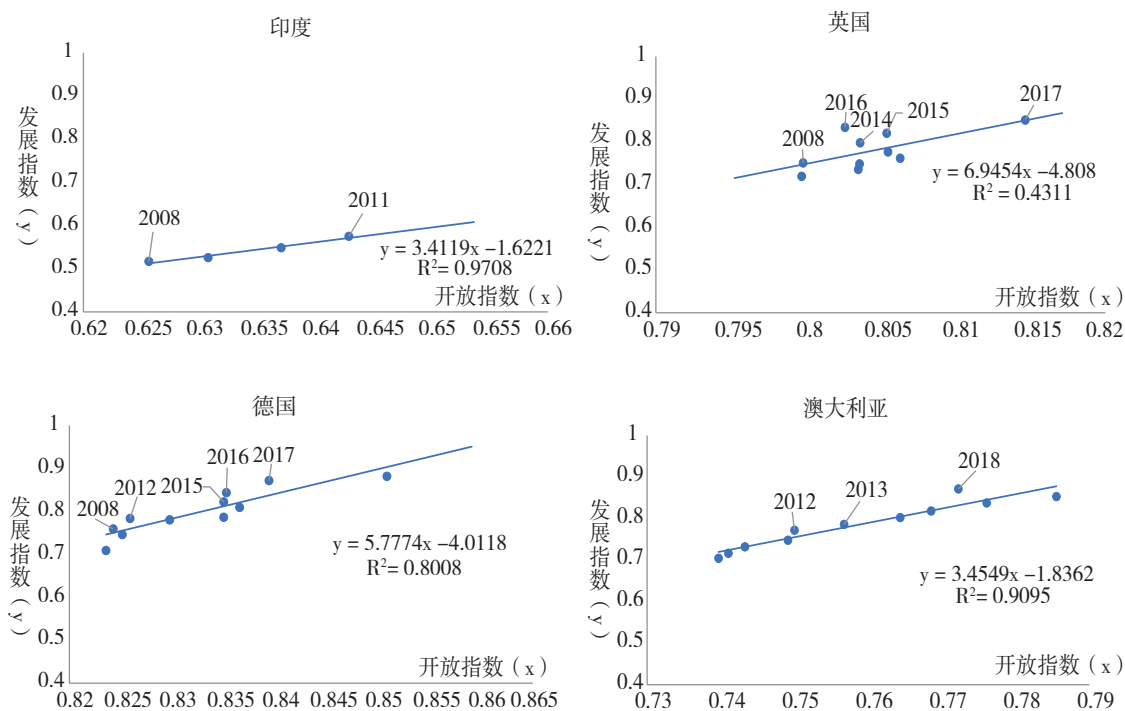


图2.3 较高水平的合意开放年：印度、英国、德国和澳大利亚，2008-2020年

三 结论与政策启示

迄今为止，开放度的合意性评估并不是一个在理论、方法和数据等方面都很成熟、完备的议题。本章尝试在这些方面提出一些看法，以抛砖引玉，期待各界读者进一步研讨。

本章关于合意开放度的探讨得到如下一些结论和政策启示。

（一）合意开放不难，最优开放不易

特定开放度是否合意，只需看与其相匹配的开放能力是否超过现实开放能力的最大值。没有超过该最大值的开放度，都是合意的开放度。

最大化地利用开放能力，实现最大的合意开放度，进而达成开放供给与开放需求的均衡时开放度最优，应是开放实践的主要目标。不过，这需要该经济

体内外兼具最佳“天时”“地利”与“人和”。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看，最大合意开放度的达成都是较难的。

（二）培育开放能力，提高开放度的合意性

决定开放度合意性的是开放能力，后者则取决于一个经济的先天禀赋和后天禀赋。

先天禀赋，如地理区位和自然资源等，具有很强的外生性，短期内难以改变，往往需要数代人持之以恒，久久为功。

后天禀赋，如人口、生产技术、劳动力素质、资本、制度、文化等，既要平衡各禀赋数量提高与质量改善之间的动态关系，也要精心统筹各禀赋之间的有机组合，为开放能力强基固本。其中，提高国家治理特别是开放治理水平，是开放能力最大化的制度性前提之一。

（三）开放必须以发展为根本指引

开放是实现发展的手段，而发展的核心是以人民为中心，既要加快经济增长，做大经济蛋糕，也要实现结构转型，特别要优化生产结构和收入结构，还要增加大多数个人行为选择的机会、提高其主要能力、改善其物质福利。

当一个经济体的发展效应不理想时，可能需要调整发展理念。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

（四）构建互利共赢的国际开放新格局

合意开放度的核心是单个经济体开放能力的充分利用特别是最大化地利用，但在开放经济体世界经济系统中，一个经济体的开放能力往往会受到开放伙伴经济体的影响。因此，一个经济体的开放要同世界其他经济体的开放相互协调，以互利共赢为宗旨，既共享开放带来的发展收益，也共担开放能力建设之责，将各自的合意开放度升级为最优开放度，从而构建起人类命运共同体。